

明清经济

王瑞平/著

与社会
发展研究

MINGQING JINGJI YU SHEHUI FAZHAN YANJIU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明清经济 与社会发展 研究

王瑞平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 北京 •

内 容 提 要

明清五百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从昌盛到苦难的时代,既有大明帝国的辉煌,也有清朝康熙乾隆三代的盛世,中华民族在闭关锁国的时代里完善着自己的发展。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是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小农经济,中国的传统农业两千年来几乎以一个模式重复着,从史书记载和考古情况来看,中国社会的制度模式、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几乎没有多大转变。本书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寻找现代社会发展的线索,探究明清兴衰的原因,总结历代改革的经验教训,以期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绵薄之力。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明清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 / 王瑞平著. — 北京 :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170-5290-6

I. ①明… II. ①王… III. ①经济史—研究—中国—
明清时代②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F129.48②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4571号

书 名	明清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 MINGQING JINGJI YU SHEHUI FAZHAN YANJIU
作 者	王瑞平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 号 D 座 100038) 网址:www. waterpub. com. cn E-mail:sales@ waterpub. com. cn 电话:(010)68367658(营销中心) 北京科水图书销售中心(零售) 电话:(010)88383994、63202643、68545874
经 售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
排 版	北京亚吉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40mm 16 开本 10.25 印张 13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 册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我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的,本社营销中心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明清 500 多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从昌盛到苦难的时代，既有大明帝国的辉煌，也有清朝康雍乾三代的盛世，中华民族在闭关锁国的时代里完善着自己的发展。十五六世纪西方的文艺复兴打破了世界平衡，而后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格局，大国不再是强国，强国不一定是大国。一向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东方文明自居的中国在西方洋枪洋炮的攻击下显示出极其脆弱的一面，清朝晚期中华民族的命运犹如漂浮在大海上的茅草屋，虽大却虚，自己也不知何时沉入大海。有着 5000 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当然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林则徐焚烧鸦片、太平天国的美丽设想、义和团运动的轰轰烈烈、戊戌六君子的英勇就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这些不朽的篇章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1911 年，清朝谢幕，明清 500 多年的历史看似结束，其实不然，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思想仍然受着这 500 多年、乃至 5000 年的影响。我们传承的思想里既有春秋战国形成的诸子百家文化的精华，也有 2000 多年专制社会中形成的习惯思维，创新又保守、进步又固封、开放又自守，矛盾体处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明清的社会专制而又一统，存在 200 多年的明朝，其政治体制稳定而又不僵硬，其间的繁华也涌现出资本主义的萌芽。清朝社会发展虽承袭明朝，但其处处体现出来的民族压迫又严重影响了历史的进步。清朝是一个专制终结的时代，也是一个近现代开启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讲话中说到的“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其实就包含了这个道理。历史的发展处处充满着哲学的道理，物极必反，中华

民族新的历史图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是延续了 1000 年多年的小农经济,中国的传统农业 2000 年来几乎是以一个模式重复着,从史书记载和考古情况来看,中国社会的制度模式、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几乎没有多大转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子里。人们习惯了大中华的稳定生活,在大多数时间里其乐融融,人与自然保持着和谐有序的关系。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战乱不息而使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呈周期性倒退或停滞,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体制未能孕育出一个新的制度。明清人口是中国人口发展的拐点时期,之前的有记载的 2000 多年历史上,中国人口一直未超过 6000 万人。虽然很多专家认为中国古代人口漏记严重,但基本数据还是不可能有大的改变的。明朝 200 多年人口记载也从未过亿,到了清代康熙皇帝摊丁入亩之后人口发展开始出现新变化,人口突破一亿、两亿、三亿,鸦片战争时已达到 4 个亿。明清时期的文化也体现了时代的特点。明清两朝 500 余年,科举考试达到鼎盛,明清两朝科举共有 10 万进士题名,八股文水平炉火纯青,名著甚多,犹以长篇小说为著。《西游记》的文笔与思想成为历史丰碑,千古传诵;《三国演义》《水浒传》亦成为中华民族 500 年之精神食粮。就连被视为“黄书”的《金瓶梅》其文笔也令人叹为观止。《红楼梦》更是集语言之大成。明清文学的优美文笔已成为历史不朽的篇章。文学可以改变人的思维,也可以固化人的思维。明清文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顶峰,令人回味,但渐渐远去,对于现代成长在互联网环境下的青少年来说已经大多不知水浒,也不知三国,更不知红楼。只有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出生的人脑子里还有着这些名著深深的烙印。历史上的一切如过往烟云,翻开历史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更新得这么快,专业学习历史 36 年的我已明显感到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总是想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寻找现代社会发展的线索,思考春秋战国那个中华民族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迸发的时代,细考诸子百家著作每句话的含义。总想模仿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究历代兴衰之原因，理历代改革之经验教训。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虽穷力思考，偶有点滴，但终觉无获，空想而已。历史在进步，时代在前进，但愿通过努力的思考我不会落伍太远！

笔者

2017 年 3 月

目 录

前 言

一、明代人口之谜探析	1
二、明清时期大运河上涌动的思想浪潮	10
三、明代的商业文化及其影响	21
四、明清时期商丘的集市贸易	37
五、清代钦差对科举舞弊案的查处与作用	48
六、清代钦差在河工的监督与作用	55
七、尹会一主政河南期间的政治作为	62
八、清代人口激增的一般原因与根本原因	68
九、为官楷模 治水名臣 ——林则徐在河南的治水功绩及其影响	78
十、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对纳西族的影响	86
十一、《西游记》中的科幻思想研究	93
十二、吴承恩与达·芬奇比较研究	100
十三、《西游记》中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交融	107
十四、水神情结对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影响	114
附 录	121

一、明代人口之谜探析

明朝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从 1368 年朱元璋即位到 1644 年崇祯帝自杀,共有 276 年的历史。在这 276 年之中,国家基本上是统一的,政局大体是稳定的。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口也应是呈上升的趋势。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明代的户口数字在升平时期却多次莫名奇妙地大幅度下降。当时及后世的一些学者对此现象做过多种解释,但均未能使人信服。本文所论就是笔者在读史过程中对“明代户口之误”所形成的一些看法,总结出来以求教于学界同人。

(一)明代的户口统计

1. 明代的户口统计只计男口而不计女口

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在全国进行人口普查,第一次公布全国有户 1065.4 万余,口 5987.3 万余。这是在经过元末连年不断的天灾和大规模战乱之后明朝初期的人口数字。根据史籍记载,这个人口数字是明代及以前朝代人口记载的几个最高数字之一。特别是在立国初期出现这么大的人口数字,实为历代所罕见。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这是个只统计男口的数字。

宋代以后,程朱理学兴起,妇女的社会地位下降,其社会作用也随之下降。在户口统计中再统计妇女已无任何实际意义,只会增加统计的麻烦。故而宋代时已不统计女口,而只统计男口中成丁的部分,于是才有宋时户均人口两口左右的记载。元朝时,妇女的社会地位继续下降,明时进一步下降。且宋以后,妇女缠足

之风盛行,人们以不缠足为耻,以妇女缠足为有教养的标志。所以,妇女竞相缠足,而缠足之后,妇女进一步脱离了生产劳动。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人口统计自宋以后就不再统计妇女了,即只统计男口,或只统计男丁。明代应为统计男口之属。

2. 明代记载户口资料之分析

中国封建社会赋役法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逐渐从全部人口与土地承担转向男丁与土地承担再转向由土地承担赋役的过程。到了明代,赋役制度已与妇女没有任何联系。《明史·食货志》记载:“(太祖)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曰秋粮,凡二等。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口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职役优免者。役曰里甲,曰均摇,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摇役,上命非时曰杂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簿,以均适其力。”上文中,“民始生,籍其口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显然是说明只统计与赋役有关的男口,如果是包括女口则不能说“籍其口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①明人王世茂在《仕途悬镜》中记载:“黄册十年一造,实民生利所关,居官者每以弊端丛积,不易清查,委之吏书,蠹政多矣。须于未造之先,预令里甲,各将该图户丁田地,开报在官,取吊数解黄册旧底,并积年书总及见年人役,隔壁查算。……丁产开报不实者,该甲同罪。”^②明人徐夏柞在《花当阁丛谈》中亦说:“淮以北,土无定亩,以一望为顷,故每多欺隐田粮。江以南,户无实丁,以系产为户,故多脱漏户丁。”^③从中可知,明政府在造黄册时,特别注意统计成丁人数。

明代也有个别地方,地方官有为调查民情、断官司等而统计全部人口的。不过,这与黄册不同,不是上报用的。这种户口册

① 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2:卷七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王世茂,仕途悬镜:卷一.

③ 徐夏柞,花当阁丛谈:卷一.

叫“烟户册”。史载，“某县为清理烟门事：照得本县分为父母，一邑之民，皆如子弟眷属……督令各好甲，造烟门册一本，以便清查”^①。这种统计显然与黄册所统计的范围不同。

明人顾起元在《客座赘语》卷二中说：“上元：洪武初，户三万八千九百有奇，口二十五万三千二百有奇。正德八年，户二万九千一百六十有奇，口一十三万五千八百有奇。万历二年，坊厢户六千一百二十九丁，船居户五百九十八丁，里甲户二万九百九十丁，总计二万七千七百有奇。江宁：洪武二十四年，册户二万七千有奇，口二十二万有奇。成弘以来，册户五千一百一十二，口一万一千二百有奇。正德十年，册户四千二百一十，口九千五百一十，畸零客户九百二，口一千七百三。万历二十年，户三千二百三十九，回回达人户九，口九千二百三十，里甲户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二，口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四。总计二县人户丁口，视国初十不逮一。”在这里，有两处可以说明当时人口统计只计男口不计女口。一是两个不同年代的户口数比较，洪武时两县人数加在一起是47万多口，万历时期两县人数加在一起是5万余丁。顾起元说“视国初十不逮一”，显然是把这两个数字相比较。如果说前一个数字分不清是否只记载男口的话，而后一个数字则显然只是男口。顾起元作为当时人绝不会拿全部人口数和丁口数去相比较。二是顾起元在提到人口时，有时称丁，有时称口，但从史料记载的内容分析，这都是只记男口，而不包括女口。如文中所记“万历二年，坊厢户六千一百二十九丁，船居户五百九十八丁，里甲户二万九百九十丁……万历二十年，户三千二百三十九，回回达人户九，口九千二百三十，里甲户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二，口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四”，此文中所用显然是丁口通用。

明人谈迁在《枣林杂俎》中说：“《上海县志》户口备载妇女。洪武二十四年，男子二十七万八千八百七十四，妇女二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九。永乐十年，男子十九万九千七百八十一，妇女十

① 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七万八千六百四十七。其数相准。至弘治十五年,男子十七万九千五百二十四,妇女八万一千二百九十七。隆庆六年,男子十五万八千五百三十二,妇女三万四千四百三十五,数不相准,则今醇伪之殊也。按各郡县志户口不载妇女,特录之。《临津县志》载户口分男子成丁,不成丁,妇人大小。”^①从上文可知,当时绝大部分县志是不载妇女之数的。这说明黄册的户口数中不包括妇女,如果包括妇女,编志者不会把妇女人数去掉而只记男口。只是极个别的地方在造“烟户册”时统计了妇女的人数,故而录在县志之中。因此,对妇女人数的统计也就不太认真。从《上海县志》所载妇女人数来看,这些数字不像是上报数字。特别是弘治十五年(1502)和隆庆六年(1572)的数字最为明显,如果将此数字上报,不是弄虚作假吗?上海县令恐怕绝不会做此傻事的。这也证明明代的户口统计只计男口而不计女口。

万历时期,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内容为“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金募。力差,则计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一条鞭”。^②“一条鞭”法不仅与妇女无关,而且将属于丁男承担的一部分赋税摊入田亩。“量地计丁”说明了当时政府统计人口的范围与方法。

天启元年(1621),给事中甄淑言:“辽饷加派,易致不均。盖天下户口有户口之银,人丁有人丁之银,田土有田土之银,有司征收,总曰银额。按银加派,则其数不漏……且小民最苦者,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鸯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宜取额丁、额米,而衡而定其数,米若干即带丁若干。买田者,收米便收丁,则县册不失丁额,贫民不致赔累,而有司,亦免通赋之患。”^③上文中只提到男丁而未提及女口,黄册所失也只是说失“丁额”。可见黄

① 谈迁,冬林杂想·智集。

② 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2:卷七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 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2:卷七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册所记只是男口。甄淑并在文中指出了“失丁额”的原因。

(二) 明代人口总数的估计与推算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明朝存在的 276 年间,有 138 个年度的户口数,可以说人口数字记载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从 1402 年到 1520 年的百余年间年年有户口记载。^① 然而,让人失望的是这些人口数字与明朝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反,在战乱之后经济凋敝时期人口增多,而在升平时期人口减少。这种奇怪的人口数字记载,使后人迷惑不解。究竟明代人口数字代表着什么呢? 人们作出过多种猜测。笔者认为,这只是明王朝为了摊派赋税摇役而统计的男丁口数。下面对明王朝各个时期人口统计的真实性进行初步的分析:《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四十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户为 1065. 4362 万,口为 5987. 3305 万。应该说这个数字是比较接近实际的。为什么呢? 这主要是明初中央的控制力空前强大,特别是朱元璋为清查户口所采取的特殊手段即大军点户,使得户口清查比较彻底。史载:“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帐,你户部每家出榜,去教那里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府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② 朱元璋自幼生长民间,深知元朝时统计户口的弊端。因此,为了获得全国的真实人口数字,朱元璋是下了决心的。当时全国计有士兵 121. 4931 万人(按洪武十四年(1381)全国有 5987. 3305 万口计算,平均每 49 人中

① 赵文林,谢淑君. 中国人口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② 李诩. 戒庵漫笔:卷一.

就有一名士兵)。^①“大军点户”的结果使得人口统计就比较接近实际,并为明王朝后来编造黄册奠定了基础。因此,一般认为,明朝初期的人口统计是比较可靠的。

永乐以后,其户口统计的真实性逐渐减小,明人王世贞曾说:“国家户口登耗,有绝不可信者。如洪武十四年(1381)天下承元之乱,杀戮流窜,不减隋氏之末,而户尚有一千六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三百五。其后休养生息二十余年,至建文四年(1402)而户一千六十二万六千七百七十九,口五千六百三十万二千二百七十九,何也?其明年为永乐元年(1403)则户一千一百四十一万五千八百二十九,口六千六百五十九万八千三百三十七。夫是时靖难之师,连岁不息,长淮以北,鞠为草莽,而户骤增至七十八万九千五十余,口骤增至一千二十九万七千三百十一,又何也?……然则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②文中将户口不实说成是官吏不负责任。其实,责任也不完全在官吏,而是在明中央政权的控制力衰弱的情况下,地方官纵然了解实情,也无能为力。

《明史·食货志》记载,“户口之数,增减不一,其可考者,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户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弘治四年,户九百一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太祖当兵资之后,户口极盛。其后承平日久,仅不及焉。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其时民数反增于前。后乃递减,至天顺间为最衰。成、弘继盛,正德以后又减。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或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而要之,户口增减,由于政令张弛。”^③此处“户口增减”应该说是国家统计的户口册上的数字增减,而并非真正实际人口的增减。当国家政权的

① 孙达人,《明朝户口升降实考》,文史哲,1980,(2)。

② 王世贞,《禽州史料后集》:卷六十。

③ 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卷七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4。

控制力加强时,户口册上的人口就增加,反之就减少。所以明代永乐以后,国家统计严格时,人口就增加一些,政府控制力衰退时,户口册上的人数就减少。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政府统计的只是男子的户口,而男子的户口是和国家的赋税摇役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方是设法摆脱国家户口的控制,而另一方是设法加强对户口的控制。如果是女子户口,就没有必要隐瞒了,因为女子对国家的赋税摇役不承担任何义务。

根据上面的资料,我们认为明太祖时期的人口统计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就以洪武时期的人口为基点来计算和推测明朝中后期的人口数字。

首先看明代户口统计中的漏口数量。明代中后期户口统计中的漏口现象是非常严重的。据时人记载,“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嘉靖)四十年来,赋税日增,摇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人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人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①农民如果离开了土地,政府就很难再掌握其户口了。故而,这十分之六七的户口流失是必然的。当然,这里说的十分之六七应是指全部人口而言。史籍又载“人口与业相停而养始不病,养不病而后可以责民之驯。今按于籍口六万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帝三倍之。而一邑之田仅田十余万亩,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等其类而分之,止须数千家,而尽有四十余万之田矣。合计依田而食与依他业别产而食者,仅可令十万人不饥耳。此外则不沾寸土者尚十余万人也。然即今不占于富而并分之土,亦不足矣。”^②按文中所说,在籍人口为6.2万,加上三倍的漏口,即应有人口2.4亿人左右。

以上两则资料都说明,明代的漏口当为在籍人口的三倍左

① 何良俊:《四方斋丛说》摘抄。

② 徐渭:《徐文长集》卷十八。

右。当然这两则资料都是说明代中后期人口情况的。明朝的大部分时间,户籍上所统计人口在 5000 万至 6000 万之间。明朝中后期以此为基数再加上三倍的漏口,其总人口应在 2 亿至 2 亿 5 千万之间。这比何炳棣在《1368—1953 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中估计的 1600 年中国人口应在 1.2 亿至 2 亿之间和帕肯在《1368—1968 年中国农业发展》一书中估计的 1600 年中国人口应在 1.2 亿到 2 亿之间的数字都要高。^①

其次看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如果不是因为失去土地或天灾人祸是不会轻易离开家乡的。因此,明中期大批流民的出现,不是因为天灾,也不是因为人祸,实际上是“人口过剩”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已。我们在研究明代人口时要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正如李洵先生所说,明代流民出现的“真正的、根本的,经常起作用的原因,不在灾荒和兵燹,而是当时贵族大地主的占夺农民土地狂潮。小土地所有者或自耕农民的经济地位十分脆弱,一般经受不住灾荒或意外的打击。更无力抗拒贵族大地主对他们的吞噬。”^②土地兼并激烈其实是人口增长的结果,试问大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干什么?他们兼并之后仍然需要人耕种,而加入流民队伍的农民是在连可佃种之田都没有的情况下才成为流民的。这些流民为了生存到处流浪,最后像洪水般地拥进深山老林。这正是明代人口的持续增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明人张履祥在《补农书》中说:“吾里地田,上农夫一人,止能治廿亩。故田多者,辄佃人耕植,而收其租。又人稠地密,不易得田,故贫者赁田以耕,亦其势也。”^③上农夫一人,只能耕田廿亩,而中下农夫还种不了这么多亩。明初耕地就达 800 多万顷,而其后,明朝政府还鼓励农民大力垦荒,耕地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

① 何炳棣,1368—1953 年中国人口研究;帕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发展民》,美国坎布里奇大学哈佛出版社,1959。

② 李洵,试论明代的流民问题,社会科学辑刊[J],1980(3)。

③ 张履祥,补农书:卷下

明朝中后期土地隐瞒现象越来越严重。故而政府土地册上的耕地也越来越少,但随着耕地面积总数的扩大以及某一时期政府对土地清丈的认真,耕地数字就会上升。且按明初的 800 万顷耕地计算,要将这些土地全部耕种需要农夫 4000 万,以每一农夫养活五口之家计算,明朝人口最多时亦应在 2 亿以上。

综上所述,以明代人口统计只计男口而论,明初在洪武时期,以史籍所记人口再加上同数的妇女,人口亦应在 1 亿以上。到万历时期,明朝经 200 年的发展,虽然史书所记人口数字仍与明初大致相等,但根据汉朝、唐朝、宋朝、元朝几个朝代人口由国初人口数达到王朝人口发展高峰的时间和所增长到的人口数来看,明代万历时期的人口较国初翻一番是属于正常人口增长范围内的。汉初人口约为 1400 万,到公元 2 年全国人口数为 5959.4978 万。如果从公元前 206 年算起,到公元 2 年共 208 年。唐初人口约为 1170 万,到天宝十四年(755),全国人数为 5291.9309 万。如果从公元 624 年算起,到公元 755 年间共有 131 年。宋初人口约为 2114.9562 万,到公元 1124 年为 8853.9307 万。如果从公元 960 年算起,到公元 1124 年,其间共 164 年。元初全国人口为 7530.6449 万(此为公元 1290 年人口数)。从公元 1290—1351 年的 60 年间,元朝国内形势基本上是稳定的,人口不会下降,只能上升。60 年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按 60 年翻一番算,元末人口应为 1.4 多亿。经过元末农民战争死亡人数 2000 万,到明初时应有 1.2 亿。此正与明初人口所记只载男口吻合。因此,明万历时(公元 1600 年前后)人口当在 2 亿以上。人们普遍认为的清代人口激增其实在明代就已经出现,只是由于明末连年不断的天灾和战争才使这种激增暂时停止,以后随着清朝的统治在全国的稳定,激增的趋势又重新出现,并且超越明代,使中国人口数上了新台阶。

二、明清时期大运河上涌动的思想浪潮

研究明清思想史,我们就会发现明清思想与运河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大运河连接的不仅是五大水系和 1794 千米的航程,它更是一条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无处不在的涌动的思想之河。大运河涉及黄河与长江这两个古代文化、文明的核心地区,连接着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等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区域,被誉为“古代文化长廊”。运河沿岸的城镇多达两千余座,其中许多是古城、古镇。这些城镇被运河连接在一起,它们之间的联系不仅表现在经济和文化上,更表现在观念和思想上。

(一)大运河与明清社会观念的变迁

京杭大运河跨越今京、津、冀、鲁、苏、浙、豫、皖 6 省 2 市,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京杭大运河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是一曲文化的乐章,是一架思想的桥梁。大运河的开通,为实现杭州与太湖流域、黄河流域,乃至海外各国的联系与交流,架起了江海黄金大通道,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运河区域自然、生态、生产环境的改善。大运河开通前中国的南北交通非常不便,信息也传播很慢,南北存在不同的思想体系,淮安、镇江、无锡、常州、扬州、苏州、杭州属于南宋以来的朱熹理学思想的重要传播区,临清、德州、聊城、济宁、北京是传统的孔孟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运河的开通推动了运河区域社会发展的进程。各地商帮的经营活动将运河区域的农产品、手工业产品等卷入市场流通领域,由此也带来了该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工商业城镇的繁荣、世情民风的变化。明清时期的京杭运河区域是中国东部的